价格理论与实践
Price:Theory & Practice
ISSN 1003-3971,CN 11-1010/F

《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探赜
作者：龚云，李雪银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6.158
网络首发日期：2025-07-15
引用格式：龚云，李雪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探赜[J/OL]．价格理论与实践.
https://doi.org/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6.158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网络首发时间：2025-07-15 15:19:57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1010.F.20250715.1125.002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探赜

龚 云　李雪银

内容提要：人民性是贯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与逻辑主线。从逻辑层面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是承继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汲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弘扬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人民情怀；从内涵层面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经济改革依靠人民、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和经济成效由人民评判四个方面；从价值层面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在于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筑牢根基、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力量、为推进经济强国建设注入动力。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人民性；当代价值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06.158

文献标志码：A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历史发展新的要求与特点，顺应时代潮流与人民需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解放的理论逻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民为邦本”的价值传统深度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以“人民主体论”为核心的经济治理新范式，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回答了经济发展为了谁，经济改革依靠谁，经济成果由谁共享，经济价值由谁评判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的逻辑溯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承继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植于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历史文化沃土，汲取于中国共产党立党执政的鲜明底色，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思想结晶，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立场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汲取与发扬，更体现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人民情怀的传承与弘扬。

（一）理论逻辑：承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

立场作为人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决定了理论构建与策略选择的本质差异。在经济学领域，立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的学说，其直接映射出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例，该学派诞生于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阶段，其理论体系始终立足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他们虽率先系统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如劳动价值论奠基、剩余价值萌芽分析等），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却刻意掩盖了物化经济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本质。这种阶级局限性导致其理论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将劳动者抽象为脱离社会属性的“理性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主要作者介绍：龚云（1971-），男，汉族，湖北南漳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本文通信作者：李雪银。

经济人”，用商品交换的表象模糊劳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包装为永恒的自然法则，否认其历史暂时性。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立场束缚使其无法穿透现象看到剩余价值的本质，最终沦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剥削的本质，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破除资本主义桎梏、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在物质生产力推动下生产方式变更的历史，然而历史也首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变更生产方式的基本力量——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物质生产资料是人通过社会实践创造的，最终归宿必然指向“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由此揭示出以需要为基础的利益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直接目的和内生动力，即“现实的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为富人创造出财富，却为其自身带来了赤贫，因此，他主张“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使全部生产力集中到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遵循了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内生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定性，在应对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奋斗目标、初心使命、发展理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诸多方面论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规律的认识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在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具体实践和发展。

（二）历史逻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命脉，不仅凝聚着民族文明、风俗习惯与精神追求的精髓，更是在五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由多元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熔铸而成的文化瑰宝。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既是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刻形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核心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重要使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③，将文化自信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成果，正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到“协和万邦”的全球视野，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到“经世致用”的实践哲学，全方位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明智慧深度融合的新境界。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文明根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民本思想沃土。从《尚书·五子之歌》首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圭臬，到《荀子·王制》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揭示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的历史规律；从《管子·治国》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经济哲学，到《战国策·赵策》确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施政基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以民为本的价值主线。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内核，既是对“民为邦本”的赓续传承，更是对“利民为本”的时代升华——从“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从“共享发展”的制度设计到“造福人类”的天下情怀，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明民本思想深度融合的理论体系，使传统治理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济世情怀与民本智慧，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纵观典籍典册，从《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的善政实践，到《史记》论述管仲通过“设轻重鱼盐之利”实现“赡贫穷”的制度创新；从《道德经》揭示“贵以贱为本”的治国根基，到魏源《默觚》提出“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治国之策，中华文明始终将纾民困、解民忧、聚民心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实践，既传承着“履适足而治利民”的传统政治智慧，更开创性地构建了系统的民生发展体系——以“精准扶贫”来消除绝对贫困，用“乡村振兴”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发展质量，经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实现全民共享，这些重大战略既是对“必先富民”的现代诠释，也是对“利民为本”的实践升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深度融合的理论特质。

①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②资料来源：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③注释：“两个结合”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实践逻辑：弘扬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人民情怀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②。从《共产党宣言》确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原则，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始终遵循着以实现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追求，这种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政治立场，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源泉，更是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的生命密码。

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将人民立场融入血脉，在不同历史时期以理论创新赓续人民至上的执政传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性提出“动员群众开展经济战线运动”的战略思想，强调既要“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又须“极力改良民众生活”③，通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经济建设著作，系统构建了服务革命全局、改善民生福祉的经济建设理论体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改革开放实践，将“让人民满意”确立为核心价值取向，要求党的方针政策始终以“人民拥护、人民赞成、人民高兴、人民答应”为检验标准④，这一执政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过程，使现代化建设成果切实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强调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通过“办实事、办好事、办得人心的事”⑤，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象化为维护群众利益的实践准则。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求经济建设既要着眼“经济社会长远战略目标”，又要紧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种在经济建设上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演进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共进的政治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科学判断中国主要矛盾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⑦，坚持“现实的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建设依靠人民、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其鲜明的人民性内涵，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与核心价值坐标，构成了贯穿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的鲜明主线。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为四个维度的统一：其一，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人民需要”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第一信号，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衔接；其二，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力源自人民创造伟力，强调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放管服”改革中保障人民平等参与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其三，经济成果的分配坚决贯彻共享原则，通过三次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将脱贫攻坚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四，经济价值的评判标准始终以人民满意度为核心，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经济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建立覆盖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综合评价体系。这种人民性特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本质的继承，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规律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发展目的论与方法论在人民立场上的高度统一。

（一）经济发展要满足人民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资本增殖置于劳动人民需要之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则确立了“满足全体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本质属性。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下，社会主义制度使劳动二重性矛盾得到根本克服：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与抽象劳动形成的价值在公有制基础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
②资料来源：《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③资料来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第122页。
④资料来源：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⑤资料来源：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2页。
⑥资料来源：《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⑦资料来源：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67页。

上实现统一，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又是劳动成果享有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通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转化为满足人民多层次需要的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关系变革推动“需要—生产—分配—消费”的循环始终围绕人民福祉展开，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当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够以最小消耗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将这一原理具象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机制，使供给体系精准对接人民需要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合理调节物质变换”的理论构想，又创造性地将生产力发展路径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相衔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传统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面临动能衰减、增速换挡与结构性失衡等深层挑战，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尚在构建之中。这一转型期的核心在于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已经从“有没有”的量级满足转向“好不好”的品质升级①，不仅要求更高水平的物质供给，更追求教育公平、生态环境、精神文化等多元维度的获得感。破解这一矛盾的根本路径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立场，并贯穿于经济制度完善、供给侧改革深化、新发展理念践行等全过程。如通过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中高端产品服务供给，精准对接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痛点。这种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满足需要”的基本规律，又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构建起需求识别与政策反馈的闭环系统，最终实现发展质量变革与民生福祉提升的辩证统一。

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得到了系统性贯彻与创造性转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唯物史观中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主体性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配性，在消费领域着力破除了制约内需释放的体制性障碍。如在多元化服务消费需求中构建了“放宽准入—优化监管—质量提升”的闭环调控机制，推动健康养老、家政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既激活了传统消费的存量潜力又培育了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增长点；在住房供给体系改革中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核心定位，通过因城施策的动态调控模型破解“高周转—高负债”的资本异化逻辑，以装配式建筑、智能家居等技术迭代推动居住空间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使住房回归其使用价值本质；在医疗保障领域以药品耗材追溯机制为技术支撑，构建起“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监管体系，通过带量采购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双重驱动，将资本主导的过度医疗扭转为以健康绩效为导向的价值创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哲学具象化为碳账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制度创新，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引导生产要素向低碳领域集聚，使生态福祉成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发展红利②。这一系列改革实践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当代发展，既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改革的动态平衡实现了经济质效提升，又在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重构了经济发展的人本价值坐标。

（二）经济改革要依靠人民力量

马克思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力源自人民首创精神，这直接对应于唯物史观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本体论。在“放管服”改革中，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实质是通过调整上层建筑（如行政审批制度）释放被束缚的市场主体活力，使劳动者从“物的依赖性”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过渡。制度创新（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数字政务平台建设）作为生产关系调整的具体形式，其目的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这既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现实映射，也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劳动的辩证否定。因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以人民的主体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以实际物质水平的提高来解决群众现实的生存与生活问题；还要以人民为中心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更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以保证两者相适应，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而物质生产劳动者既是核心生产力要素，也是变革生产关系的主体。他强调，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必须与劳动者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且劳动者始终是其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赋予人民“物质财富创造者”与“生产关系变革主导者”的双重角色。这种理论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过程中体现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打破资本垄断格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赋予农民财产性权利，本质上将劳动者从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462页。

②资料来源：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5年3月13日，第01版。

资本附庸转化为自主联合生产者。这种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构想——劳动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实现个体自由发展，当劳动者掌握生产过程控制权与剩余价值分享权时，其创造潜能得以充分释放。我国的制度变革正是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优化公有制经济实现方式激发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微观创新活力与宏观制度科学性形成辩证统一，既遵循价值规律优化配置资源，又依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成果共享，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这种改革路径印证了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根植于人民群众改造生产关系的实践，而制度创新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为人民力量的释放构建了制度载体。

人民既是改革成果的共享主体，也是改革实践的创造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体制机制桎梏与利益格局调整的双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①。要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关键在于构建“实践—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即通过“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将制度创新转化为发展动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性着力点，在于通过破除各类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化产权结构、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重塑激励体系、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升经济效率等举措——推动生产关系层面的深层调整与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不仅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赋予人民群众更充分的经济自主权，使其在生产、交换、分配各环节中实现主体价值，进而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实现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与发展质量同步提升的辩证统一。

（三）经济成果要实现人民共享

经济成果归谁所有，这是经济发展的价值指向问题。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②。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既是财富创造主体，也是价值共享主体。如果经济成果的分配背离了全民共享原则，不仅会导致劳动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成果支配权产生割裂，更会强化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逐利性的结合，使市场机制沦为扩大贫富分化的工具，也会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系统阐释了“共享什么”这一核心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③。这一重要论述从两个维度构建了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空间维度上，要求实现发展成果的全领域覆盖，通过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难题，不仅要在经济领域提升民生福祉、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更要系统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共建共享，全方位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生态安全等多元化需求；在时间维度上，强调发展过程的全程参与共享，将共享理念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和不可持续问题，既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与机会，又持续优化教育、医疗、文体等民生领域的供给质量，构建起全周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机制。

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经济成果的共享更在于人民。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诠释了“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要义，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奋斗—高质量发展—渐进共享”三位一体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以全体人民共同奋斗为根基，既通过激发劳动者首创精神形成共建机制，在生产端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在分配端建立三次分配协同制度（初次分配聚焦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再分配强化税收社保调节、三次分配引导公益慈善），又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更遵循渐进共享原则，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夯实底线保障，以培育橄榄型社会优化分配结构，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破解三大差距，系统构建起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发展格局，既兑现了“全面小康不落一人”的庄严承诺，更开创了“共同富裕循序渐进”的实践范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具有制度创新效能的中国智慧。

（四）经济成效要坚持人民评判

让人民群众作为评判经济发展成效的主体，从根本上回答了经济发展为了谁、让谁满意、由谁检验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④，这就指明了人民群众是检验经济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②资料来源：《列宁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③资料来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④资料来源：《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3年12月27日，第06版。

发展成果效益的最终评判标准。

那么如何检验经济发展是否有成效呢？答案是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的利益得失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在经济发展中坚持和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最终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效是否真正惠及到人民身上，是否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是否使人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持续加强对经济领域各项工作的监管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减少市场秩序的紊乱与失灵。通过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治理机制，为人民营造了更加规范、公正、高效的市场竞争与消费环境，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是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①。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与民生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获得感作为发展成效评价标准的重要地位。获得感是客观现实的体现与主观感受的有机统一，当人们切实感受到住有所居、病有所医、教育公平优质、权益得到保障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时，便会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满足，进而产生获得感。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作为重要衡量尺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经济思想源于人民、依靠于人民、共享于人民，人民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本质属性。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人民性意蕴将为增进民生福祉筑牢物质根基、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磅礴伟力、为推进经济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一）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筑牢根基

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实践，既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也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视角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体现在其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从而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内涵。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引领高质量发展，破解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既解放了生产力，又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等举措，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这种从“物的依赖”向“人的解放”的转向，既遵循了经济规律，又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

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②这一主要矛盾，将发展目标从单纯的物质增长转向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维需求，是对“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调整”这一哲学原理的运用。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系统性发展逻辑，将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锚定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指标增长。这一转向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诉求，更通过制度性安排将“人民至上”的理念嵌入经济治理全过程，如通过“三次分配”调节财富分配、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代际公平等制度性安排。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关系必须服务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属性，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最终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扬弃。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强化政府公益调节，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这一路径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范式，将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锚定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解决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新范式：只有将人民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以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创新突破传统增长路径依赖，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驱动产业绿色智能升级，既遵循生产力规律，又通过创造优质岗位、改善生态直接惠及民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当代探索，更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理论基础。

（二）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力量

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导向，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质属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通过制度、政策等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在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经济思想从这一辩证关系出发，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经济工作的全过程，既强调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又注重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优化公共服务等途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仅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更注重解决就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92 页。

②资料来源：习近平：《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年版，第 441 页。

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的辩证统一。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继承与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锚定于人民福祉的增进，而非单纯追求资本积累或技术指标。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通过经济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得以具象化，使抽象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知、可衡量的现实成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确立为历史分析的逻辑起点，这一方法论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展开中。面对脱贫可持续性、收入差距、生态约束等发展瓶颈，习近平经济思想以问题导向精准施策；依托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等系统方案，集成发力，在破解局部矛盾与优化整体架构的协同中实现对经济规律的深刻驾驭。如在脱贫攻坚战中实施的“精准施策”“志智双扶”等策略，不仅解决了绝对贫困的历史性难题，更激发了脱困群众的主体性，使其从受助者转变为发展的参与者。这种实践逻辑与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高度契合，彰显了经济政策与政治使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国内市场潜力与人民消费升级需求相结合，既夯实了内需这一经济根基，又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注入了动力。

从历史合力论的角度审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为凝聚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恩格斯指出，历史结果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实践是其中最根本的力量①。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在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广泛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如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既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的战略支撑作用，又通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同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与不同社会群体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到共同目标。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的模式，本质上是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合力”的抽象原理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使党的初心使命通过经济领域的集体行动得以实现。此外，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决策中的实践，如基层协商、公众参与预算监督等机制，确保了经济政策始终与人民意愿同频共振。这种将经济民主嵌入治理体系的创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深化，也为破解“资本逻辑”与“人民逻辑”的张力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为推进经济强国建设注入动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非抽象的技术革命或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广大劳动者在实践中对自然规律与社会关系的能动性改造。习近平经济思想将这一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深刻阐明了人民性作为经济强国建设动力之源的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必然性。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实践，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马克思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异化现象，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②，而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恢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为逻辑起点，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重构了劳动、劳动者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又在制度实践层面通过公有制的本质属性确保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使得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与创新活力能够突破私有制经济中资本对劳动的宰制，真正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更在实践中通过创新创业政策、职业培训体系等具体举措，将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转化为经济强国建设的实践动能，实现了从“被动劳动者”向“能动创造者”的质性飞跃。

从经济规律演进的深层逻辑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将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机统一，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激发发展动力”这一历史命题。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以人为核心的要素——劳动者知识技能提升、生产工具革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统一体。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正是这一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一方面，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与完善职业技能培养体系，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打破传统科层制对知识传播与技术转化的束缚，使劳动者的首创精神能够通过市场机制与国家战略的协同作用升华为社会生产力。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不仅是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更是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和制度变迁的主体推动者。如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协同创新模式，既能集中力量突

①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页。

②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破芯片、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壁垒，又能通过“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制度设计，扩大科研人员、技术工人乃至小微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参与度，由此形成的“万众创新”生态实质上重构了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使人民主体的实践智慧成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核心动能。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将创新简化为企业家精神的狭隘视角，也避免了传统计划体制下忽视个体能动性的桎梏，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新范式。

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与制度创新的动态统一基础上，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激活个体的创造潜能，更在于通过系统性重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使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升华为文明形态跃迁的历史合力。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并非静态的理想图景，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逐步展开的历史进程。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将这一理论具象化为制度实践：在产权制度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了关键领域的社会化属性，使高铁、电网、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资产服务于全民福祉；在分配制度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体系既强化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地位，又通过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将创新动能转化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治理体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将经济发展的决策权、评价权和受益权回归人民主体，使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始终贯穿“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路线。这种制度设计的根本突破在于，既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割裂状态，也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中动力机制僵化的局限，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实现了“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同步推进。由此，经济强国建设从单一维度的增长竞赛升华为社会关系的全面优化，即劳动者不再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或技术异化的对象，而是通过制度赋权成为驾驭资本、主导创新、共享成果的真正主体。这一理论逻辑的展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当代回应，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只有以人民性为核心重塑经济制度，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动力从“物的依赖”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作者单位：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雪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GONG Yun[1] and LI Xueyin[2]
(1.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is the fundamental stance and logical thread running through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Logically, this people-centered nature draws from the Marxist political-economic tradition of prioritizing the people, inherits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mbodies the people-first commitment demonstrat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conomic endeavors. In terms of substance, this philosophy manifests itself in four key dimensions: adv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people, driving economic reform by relying on the people, ensuring economic achievements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and having economic outcomes judged by the people. Regarding its value, the people-centered essence of Xi's economic thought anchors the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for all, galvanizes efforts to fulfill the Party's founding mission, and energizes the drive to build China into an economic powerhouse.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